《学术界》(月刊)
总第 277 期,2021.6
ACADEMICS
No. 6 Jun. 2021

诗学史的下潜、遥望与有我之境

——基于《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的讨论

马大勇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一部优秀诗学史/文学史的理想境界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深度下潜的文献把握与阐释,遥望中西思想文化史的复眼视域,还有一个学者必不可少的"自我"的呈现。《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在深度把握文献的基础上,对格调说、性灵说等"显学"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给出了全新的阐释;又站在思想史和西方文论背景下,对试帖诗学生成的思想渊源、格调诗学的新古典主义色彩、性灵诗学的解构特征给予了有理有节的定位。尤有意味的是,全书一直贯串着作者自己的个性与手眼,从而达成了诗学史的"有我之境"。

〔**关键词**〕清代诗学;有我之境;格调;性灵;试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6.012

林达在《历史遗留的鲠喉之骨》里曾深有感慨地说:"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长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漂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1]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诗学史/文学史写作,当诗学史/文学史只剩下一些"简明"的概念,被写入教科书,传授给一代代的学子,恐怕他们所学到的也只是"恐龙化石"而已,至于恐龙自身的鳞爪、争斗、嘶吼,侏罗纪的地貌、气候、生态,就统统被遗忘进幽深的历史空洞中去了。更何况,那些"简"的概念历经一次次冲刷淘洗以后,真的还能做到"明"吗?

毋庸置疑,蒋寅先生继 2010 年撰成七十万字的《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反思与建构》之后,又以八年时间撰成篇幅相当的《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以下称"本书"),在此过程中肯定是有着类似上面这些感想的。这两部巨帙尽管仅仅描述了清代诗学历程的一半多一点,但"还原"那条恐龙,乃至"打造"整个侏罗纪公园的意味已经十分鲜明。此种"还原"与"打造"(或曰"历史最可能事实的恰当重构"[2])说来简

作者简介:马大勇,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及现当代诗词研究。

单,其实谈何容易!在笔者看来,一部优秀诗学史/文学史的理想境界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深度下潜的文献把握与阐释,遥望中西思想文化史的复眼视域,还有一个学者必不可少的"自我"的呈现,三者缺一而不可。

一、下潜的诗学

清代是中国诗学的集大成期,以量言如螳肚,以质言若豹尾。本书《后记》有云:"韦勒克胸中装着整个欧洲近代文学批评……清代二百七十年间产生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诗论著作,现知起码超过1800部,现存仍逾1000部"。[3]多年以来,对于这片充满着未知生物与矿藏的深海,前人已经从文献、阐释、建构等诸多角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如果不能拿出超大肺活量,憋足一口气,下潜到更幽暗深邃之处,探测更多前人额头灯映照不到的地方,恐怕是不敢打出"清代诗学史"这块金字招牌的。

"下潜",首先必然体现在文献的罗掘爬梳与深入解读。近二十年来,蒋寅先生陆续出版了《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原诗笺注》等几部深具影响的清诗文献学著述,[4]现在看起来,这些文献学意义上的"止境"之作其实只是诗学史理论工作的"后勤部队",为其提供充分的"粮秣弹药被服"而已。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献是一切学术的基础,有一分文献说一分话""文献升华到理论才更有价值"等口头语在这部清代诗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极好的体证。通过对近1500部清代诗话的详尽考查,[5]对"神韵"宗师王渔洋的行迹排比,对一代巨著《原诗》的全面阐释,清代诗学史的几大关节要害已经获得了可观的突破,然而还不够,还要加上海量的笔记、序跋、书简、评点、论诗绝句、古今人论著等其他文献,[6]才可能竭泽而渔,完成诗学史的基本储备。《清代诗学史(第一卷)》所附《引用书目》不少于800种,本书更达900余种之多,二书注释均不少于2000条,这并不是简单冰冷的数字,被它们"压在纸背"(借陈平原先生语)的岂不正是"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坚忍追求?

正因为如此悠长精深的"板凳工夫",作者才有底气有信心给出这样的夫子自道:"本卷更多的是独辟蹊径,在许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拿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即便是格调、性灵、肌理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我也一一提出了与现有研究不同的论断和评价"。[7]的确,披读全书,感触最突出者正在于俯拾皆是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论断。

比如开篇第一章即是为人熟知的沈德潜。沈氏诗学,一般以"格调说"三字了之可矣,虽近年研究相当深入,几成清代诗学之大热门,[8]但作者在"所能开拓的学术空间"被"大大限定"的情形下,[9]仍然提出沈氏"已跳出清初以来唐宋、古今之争的窠臼,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诗歌史","在诗歌趣味和风格上相比明前后七子有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神韵诗学的精髓,重塑了格调派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启人深思的新判断,并且名之曰"新格调派""新古典主义诗学",[10]给了沈德潜一个最为鲜明准确的诗学史定位。尤其令人讶异的是,由于沈氏"更大的包容性",他并不全如我们印象中那样正颜厉色、道貌岸然,反而会讲出与袁枚唇吻相近的话头来。[11]这对于习惯了二者如火如荼的笔墨官司的读者来说,不免在惊愕之余,要埋头去重审清代诗学的丰富与璀璨了。

袁枚性灵说耸动天下,是比沈德潜热火得多的"显学",但留下的空白反而更多。比如,袁枚是在怎样的诗学语境中挑选了"性灵"二字写上自家大旗的?再比如,早在袁枚当世就有人说:"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12]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在讲,怎么讲的?这样的问题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出过,遑论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本书第三章开头专设《乾隆前期性灵思潮的萌动》一节,历数薛雪、吴雷发、黄子云、郑板桥、陈祖范、邱赓熙、查为仁、桑调元、彭端淑、边连宝等人之绪论,考证袁氏与薛、黄、查、郑、桑几位的渊源,其"性灵"二字的诗学来路即斑斑可鉴;对于

后者,本书则以整整一章超过十万字的篇幅来梳理“性灵诗学思潮的回响”,[13]其中不仅包括随园友生如赵翼、蒋士铨、李调元等,别具眼光地发掘出洪亮吉、方薰、吴文溥等习惯上不归为性灵一脉或声光萧寂者,甚至还爬梳出沈德潜门人钱大昕、王昶、陈受之大讲性灵的诸多文字,乃至边省云南有王宝书者,撰述手眼全似随园,遂有“随园大弟子”之目。经过如此详尽的论列,我们才真正认同作者这样的结论:“回顾以前的诗歌批评史,我还未见过有什么审美概念像性灵这样频繁地被使用在评论中,这只能说明它是当时诗学中处于主宰位置的核心观念,或者说是乾隆朝诗学的最强音”,[14]一向处于混沌中的“性灵派”阵容也就由此而军阵齐整、气象俨然了。这既是“睫在眼前长不见”的人人意中所有之题,也是清代诗学史的“斯芬克斯之谜”,本书的答案当然是令人惬意而惊喜的。

诗学的海洋是如此深邃,每下潜一个新的梯度,都能窥见更多隐秘而丰美的深层生态。诸如沈德潜的诗学传承,一般仅说及“吴中七子”而已,所谓“雪后寒蝉,声响俱寂”,[15]本书则提出格调诗学的真正传人乃是宝应才子乔亿,他在乾隆时期格调派诗论家中的代表性甚至还要超过沈德潜本人;[16]再如翁方纲以“肌理说”擅名于世,本书则提出:“在《石洲诗话》之后,他就很少用肌理论诗了,这说明肌理在他的诗学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代表着早年的诗学思想”;[17]再如“桐城诗派”的概念近年也渐为学者所重视,但对于方世举、方贞观、方观承等令桐城诗学“大纛初张”的几位诗人,姚范、刘大櫆等“对桐城诗学传统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的诗论家,“迄今为止的桐城派研究中令人奇怪地都不曾被注意到”,[18]本书一一揭橥之,从而使桐城诗派的眉目愈益完善清晰起来;再如高密诗派,虽经汪辟疆先生、严迪昌师等前辈提挈,但长久以来,大抵被当作一个地域性“小派”来对待,本书以一章篇幅剖解其来龙去脉,最终定位其在清代诗学史的新意义与新坐标:“由于他们的鼓吹,中唐诗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高密诗派承传百余年并在较广大的地域产生影响,这在清代文学史上只有桐城派可以相提并论”。[19]显然,本书每一章节的新见叠出都得益于看细一层、看深一层的“下潜”之功,从而达到了作者所期望的“将乾隆朝诗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目标。[20]

二、遥望的诗学

埋头下潜乃是诗学史的第一义,故首先揭而出之,但具备苦工夫、细工夫之学者向来不乏其人,那么这种下潜也就不是一部优异诗学史的完足条件。出色的学者是不应该只有一副紧盯在“诗学”上的眼光的,他还应该在文献的深海里仰起头来,以“复眼”去多角度地扫描遥望“诗学”背后的思想天幕、文化星空,以及可供参照会通的西方诗学中那些璀璨的风景。用蒋寅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还要特别注意这个时代诗学的公共话题、普遍性问题及其与学术文化、创作实践的多元关系……由此构成的乾隆诗学将是一个……更丰富的观念多样性和更具有学术史含量的历史过程”。[21]

本书长达五万余字的八篇绪论即堪称遥望思想文化天幕的典范,其中尤以第三篇《文人弘历与官方文艺趣味》令人最感兴味。作者以为:“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评出一个文艺兴趣最浓的皇帝,那一定非清高宗莫属”,这样定位不仅因为乾隆是古今诗人创作量的“冠军得主”(虽然其创作水准常常令人失笑),更因为他要以《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钦定四书文》等选本热切地介入文学批评,“直接根据自己的趣味来塑造当时的文学观念”。他的《御选唐宋诗醇》一出,韩愈与白居易的诗史地位如响斯应般大幅提升,“乾隆中期诗坛各派不约而同地皈依韩愈”,“沈德潜也不得不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调整对白居易的评价,同样不喜欢元白一路诗风的翁方纲、纪昀也不敢否定白居易诗”。更有说服力的例子表现在,钱载乾隆三十九年伊始几

次主持乡试时分别以“我皇上钦定□□□,嘉惠士林”为开头出题策问考生。[22]这显然已不再是文艺爱好者(哪怕他身份特殊)的一己偏嗜,其对于教育甄选制度的渗入怎能不极大地改变文人的命运、文坛的方向?不注意及此,就不可能真正落实乾隆朝与其前后时代相比的诗学特殊性。[23]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恢复试帖诗的科举改革及其影响:“那些素昧吟咏、不知平仄为何物的广大经生,则如闻晴天霹雳,惶悚莫名。从前为父兄禁习的诗歌,忽然成了应试必修的程课。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许多以举业自豪的书香家族茫然不知所措,而寒素之士更是进退失据,不知如何应对”。[24]本书引李元复《常谈丛录》的一节文字令人捧腹不已,最能看出其时科场忽然面对新功令之狼狈淆乱情形:“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始于乡闱试以排律五言八韵诗……是科江西乡试诗题为《赋得秋水共长天一色》,得天字。有士人全不解所谓,遍询诸同号舍者,或告以此限韵,当押之。遂于十六句作叠韵,尽押天字”。[25]与这种教育文化改革休戚与共的图书市场也闻风而动,仅“上谕”下达之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短短六年时间,坊间刊刻有关试帖诗之专书即不少于四十种。[26]正是在此文化史考辨基础上,蒋寅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试帖诗学”的概念,以纪昀这位“试律诗学的奠基人”为模板,对前人罕有齿及或鄙夷不屑的《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我法集》三部试帖诗著述逐次分擘腠理,并对后纪昀时代的试帖诗学、试帖诗学与一般诗学的互动与合流等问题给予了明晰的勾描。这就突破了以往集矢于《四库全书总目》透现纪氏诗学的狭隘视域,获得了把握乾隆朝诗歌特质走向的崭新体认角度。[27]

与文化视域相比,本书的中西会通意味要显得更加浓郁。作者早有《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之著,[28]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也清晰地显示了中西诗学会通比较的路径,可以说,本书更强烈地延续了这一点,如《后记》所云:“在决定撰写《清代诗学史》之前,我就将目标瞄准了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理论》的两个作者之一,但对我来说,他首先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29]正是因为对《近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的西方文论的深刻把握与消化,本书才从沈德潜载道致用、温柔敦厚、比兴含蓄等主要诗歌宗旨中嗅到了新古典主义诗学强调伦理品格之善与艺术趣味之正的强烈气息,在引用韦勒克“理想,即便不把它设想得过于崇高,在许多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仍为一大重要内容”的说法后指出:“沈德潜诗学的一切努力仿佛都是要印证这样一种论断”,“沈德潜可能是最后的、最坚决的理想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30]如此熔铸中西的定位显然比以往更加贴合了沈氏诗学的文化品格与质地。

对于几乎已经被谈烂了的性灵诗学,作者更力求从会通视角给予突破性的阐说。在列举北魏祖莹到王阳明、李贽再到黄宗羲、王彦泓等诸家表述之后,作者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判断:“袁枚的性灵乃是一个涵摄前代诸多诗学命题的范畴,这些诗学命题全都指向一个核心——自我表现……(它)否定、排斥了其他所有价值观念和技巧规则,显示出一种破而不立的理论姿态”,“如此一来,性灵论就非但不具有理论建构的意义,甚至还很典型地符合德里达的解构理念”。[31]何以言之呢?作者在其后设立《性灵说的解构倾向及其理路》《破而不立的诗论》两个小节,历数袁枚对于格调、诗教、无一字无来处、理语、名教礼法、道学气等观念的“破”,然后慨而言之:“我们在诗论中看到的袁枚,就是这样一个随时在颠覆传统观念、随处在翻诗家旧案的角色。翻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传统观念的正确性,或提出一个对立的论点,而只是要取消传统观念的绝对性,使它们变成只是可能性之一……诗学到袁枚为一大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而这大变的核心,就在于解构一切传统价值和观念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取消一切既有规范和技法的必然性和强迫

性,使诗歌写作进入一个自由的境地……袁枚对古典诗学价值观念的解构,最终归于对诗人自身身份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诗歌创作的一个解放,性灵诗学最重要的诗史意义或许就在于此”。[32]应该说,这是迄今对性灵诗学最深刻透辟、最具学理性的一段阐发,没有深刻的会通眼光与出色的会通能力是达不到这种解释高度的。

值得补充的是,作者的会通“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它既是大尺度的,又是紧密贴合中国古代文论特点的。基于与西方文论连接紧密度的考虑,沈德潜与袁枚两部分的会通意味较为强烈,其他几章则大抵归于中国传统的治学理路。对此,本书《后记》中亦有很具分寸感的自白:“他(韦勒克)认为批评史‘完全是思想史的一个分枝,跟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文学关系并不大’……我看待这一问题的原则正好相反,即充分重视理论、批评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同时,相对于批评的言论是否言之成理,我更关注的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即运用话语分析的方式来探究乾隆时代的诗学理论所包含的个性色彩,这对习惯于‘六经注我’的言说方式的中国古代文论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33]既拓宽汲取,又保持必要的审视疏离;既毫不犹豫地“拿来”,又坚守研究对象的特质内核,可谓有理有节,这应该成为值得我们遵循的会通原则。

三、诗学的“有我之境”

20 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国文科教员林传甲撰成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同僚江绍铨(亢虎)为之作序,其中有云:“林子所为,非专家书而教科书”。[34]在他看来,“教科书”乃为普及常识之用,应该“颁之学官,以备海内言教育者讨论”,那就与“瘁毕生精力,所得常不能累寸”的“专家书”有着很大不同。陈平原先生注意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提法”,[35]且对“中国学界几近牢不可破的‘教科书心态’”予以语气很重的批评:“学者们的著书立说,大都名‘撰’而实近于‘编’,这一局面,到现在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36]

“教科书”与“专家书”当然不能作一律的划分。有的“教科书”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比很多“专家书”还要“专家”,而很多“专家书”则还比不上意在普及的比较好的“教科书”。但就一般而言,“教科书”与“专家书”确乎迥异,其最深层区别正在于“自我”的呈现程度。“教科书”应该取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追求的是平头正脸、面面俱到的“无我之境”;“专家书”以“成一家之言”为鹄的,一定更企慕章学诚标举的“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37]的“有我之境”。蒋寅先生尽管声称“《清代诗学史》其实不是写给研究清代诗学的人看的”,[38]但作为深化乃至颠覆一般性“教科书”的著述,其“专家书”性质可以无疑。那么,有没有“我”?“有我之境”的比例占了多少?这不是能制造多少阅读趣味的问题,而是能否“有境界”、能否“臻高格”、能否“成一家之言”的关捩所在。

相对于诗词创作史,诗学理论史的客观色彩要鲜明得多,平正理性的门槛要高得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个人表达的空间。但披读全书,我们不仅处处看到“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关心的”一类提挈语,还能经常感觉到作者把自己温润大气而又犀利深折的人格面貌投射在了文字之间。比如,在《绪论》煞尾部分引用了文廷式《闻尘偶记》的“狂言”之后,这一段按语就颇富奇崛感:

> 文廷式眼高于天,于本朝诗文一向眇(疑为“尠”)有许可,如此评价沈、袁两家诗学倒也不奇怪,但当代研究者的论著也多不予沈德潜、袁枚乃至乾隆间整个诗学以较高的评价,重蹈前人“风雅道衰,百有余年”的旧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究其缘由,我觉得主要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文化研究倾向,常限于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或理论趋向与特定文化、思想背景相联系,给予一种学理性

> 诠释,而不太愿意去深入研究其中的技术内容和理论细节,这样一种研究看似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其实很空泛很表面,很容易导致历史视野的狭窄和关注问题的雷同。[39]

套用蒋寅先生自己的思路来说,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破”文化研究的路径(如上所云,他自己的文化研究就很有分量),而是惩于文化研究的浮泛与雷同之弊,有感而发。同时,在难掩的锋利表述中,也暗示了自己通达平正但不乏锋芒的研究路向。

正是出于这一路向的坚持,作者对每一位诗论家的理论闪光都格外珍惜,在看到他们短处的同时,也都尽量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予以“理解之同情”,给出最公允的分数。比如对沈德潜,本书即作出如下定论:“沈德潜诗学在他生前和身后的命运也与袁枚诗学截然不同,生前不曾大红大紫、风靡天下,身后也没有被弃若刍狗、饱受批评……沈德潜诗学却像金庸笔下的少林功夫,始终为众望所归,有名门正派的气象,终有清之世安享百余年不衰的声名”;[40]对纪昀,则在肯定其论诗存在若干缺陷前提下特别针对钱振鍠《快雪轩诗话》“学浅”的苛评提出驳议:“纪昀论诗即使有什么缺陷,也绝不会是学浅的问题……钱振鍠责以学浅,未免恃才放胆,目空一切,盖不足与庄论”;[41]对翁方纲的诗歌理论,作者花篇幅予以颇多赞肯,对其诗歌批评又予以“见识不高”的严厉评价:“最典型的是一味拾苏、黄余唾,轻视刘禹锡……甚至贬其诗品在郎士元、韩翃之下,见识远不及王渔洋……就是韩翃,翁方纲说他‘……骨力渐靡……’也纯属模糊影响之见。据我观察,韩翃恰恰是大历诗人中难得还残留着盛唐余风、亢爽豪迈之气不减的诗人,说他走杜甫式的变调取拗之路,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不着边际、英雄欺人。以诗论家而言,翁方纲才学都不缺,可能少了点识,即艺术判断力”;[42]至于高密诗派的李怀民,作者对他批评王渔洋“全好大言骇世”的论调几乎戟指怒斥,以为其“见识有限……至深微之处多不得解悟,有时露才扬己,欲示高明,适足自形庸陋”。[43]从这些或隐或显的锋锐词句中,我们不难感知到特属于作者、难以移置他人的手眼与声容。

强化这种“有我之境”处还要特别关注作者游移于“正文儿”之外的闲言闲语。这一类“活泛”处虽不能称多,但颊上添毫,画龙点睛,特能辨析出作者自家的心绪面目。在《绪论五》讨论“乾隆朝的诗歌风气与诗学品格”时,作者忽然插入一段《谈艺录》风格的妙喻:“诗坛的几派宗师,沈德潜才华平常,纪昀用心不专,翁方纲学过于才,姚鼐文过于诗,高密三李气局不大……袁枚倒是才情过人,争奈德行不称,终究难以号令天下。于今回顾乾隆诗坛,竟像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武林江湖。这样的江湖绝不会平静,虽不见面对面的交锋,却随时都有人试图找到诗家倚天剑、屠龙刀”。[44]钱钟书是蒋寅先生的学术偶像之一,口角如此相似应该不是巧合罢!

再如引《随园诗话》卷七“余论诗似宽实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一语后,作者有一段发挥:“这样看似简单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更严苛的要求。就像某些朋友择偶,没什么具体条件和要求,只说看着顺眼就行。可这‘顺眼’是多么高的要求啊!若要个子高,要眼睛大,要身材好,都很简单,但要让人看着顺眼就不容易了。即便世所通行的审美标准全都满足,也难保他看着顺眼呀!性灵诗学的本质正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极其主观的、着眼于效果的诗学”,[45]以“顺眼”的择偶标准解释“似宽实严”,极通俗明白而又机趣盎然,一语破的,似乎比袁枚之论还要透彻一层。

尤令笔者感受到作者“自我”之“强势介入”的段落是所引《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严蕊珠拜师”一节。袁枚对严蕊珠的提问及严的出色回答令作者想起了自己博士生面试的场景:“主试的周勋初老师问我,既然投考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先生的著作都读过吗?我列举自己读过的几种程先生著作,一一陈述读后感,并略呈(疑为“陈”)管窥所见程先生学术研究的独到之处,程

先生欣然首肯……严蕊珠……不仅读过袁枚诗集,能说出其诗兼有隐秀的独擅之处,还能背诵袁枚骈文,略知典故出处,并由其骈文之工谈到诗中用事之浑化无迹……具见学识兼备,造诣不凡。今日研究生考试,考生能如此回答,导师也该满意了吧?"[46] 如此离乎主题但本于性情的"东拉西扯",浮想联翩,就"随园女弟子对于袁枚来说,既是学生,同时也是一群理想读者和闺中知己"的结论而言,堪称文心灵动、笔花四照。如此"有我之境",令人不禁击节叫绝!

四、余　论

对于全书重中之重、独拥两章篇幅的性灵诗学,蒋寅先生当然也是给出了最多"有我"的独特判断的。限于篇幅,不能再一一列举,这里还想讨论几句的是"《随园诗话》的撰著方式及影响"一小节。

这一节分为"袁枚著述中的诗话""《随园诗话》的素材来源""打秋风的道具""报恩与自我标榜""托请之弊""滥收与疏误"六个小节,"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其写作方式"的努力及其呈现出的精彩都是极可称道的。作为《随园诗话》的痴迷者之一,笔者也是第一次如此系统深入地看到袁枚的"月亮背面",[47] 那么,诸如"我们从《随园诗话》里读到的袁枚,是一个少年以才华出众见重于前辈、中年以诗品超群为侪辈所拥戴、晚年更以德高望重为后生膜拜的殿堂级偶像,更有性情倜傥、见识过人、风流好事种种可爱的秉性流露其中,让人不能不倾倒折服,然而所有这些迷人的叙述,都不能掩蔽其性情文字背后的世俗诉求和牟利的机心"这样的论断也堪称定谳,[48] 没有什么可"翻案"的余地。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袁枚的打秋风、报恩、自我标榜、托请、滥收等一系列社会学视角的负面行径呢?[49] 笔者以为,本书虽注意到了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提出的"商贾文化意识"问题,但仅仅用来解释其"牟利动机和经营手段",[50] 而没有提升到方法论层面上认知其意义。

似乎有必要重温严先生对袁氏"商贾文化意识"的有关表述。他的《袁枚论》从袁氏家族谱乘出发,对其亲族、交游的游幕、商贾文化背景进行了诸多考辨,目的是上溯"袁枚现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袁枚文化意识对名教纲常的叛离性等一系列解读袁枚的关键问题,其中又特别关注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江宁知府刘墉意欲驱逐袁枚出境事件。在对"逐客事件"之表里作出一系列剖析之后,严先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当然不是无赖战术。免受伤害,是为了仍'有余地'。袁枚正是采用这样的处世方法和应对手段,来达到'往往如吾意'的……这与一般的儒士或执着、或迂腐全不相类。该让利时他让利,该转移时他转移,该软化时他嬉皮笑脸,时空条件有利时则又大步进占,其最终仍坚持着自己的观念和利益,不仅依然故我,而且变本加厉。""圆通是为了有利,宽博心胸是谋得发展。这无疑是封建体制下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石的观念守持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它从实质上说正是商品观念在文化意识上的反映。理解这一点,对认识袁枚诗学观的圆通博辩,一方面'八面迎敌',另一方面又'普渡众生',应极有关系。他正是以宽博、甚至不惮'滥'的方法和形态来迎击、冲刷、激荡一切板滞、陈腐、伪饰的诗学观念的。"[51]

严先生诚然是了解袁枚的种种"劣迹"的,所以在《袁枚论》结尾他说:"对袁枚本不必求全责备的,正如对他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一样。'足赤'和'完人'式的论人,均属误解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而导致苛求之举。"[52] 无独有偶,陈平原先生在谈及袁枚的"前世"陈继儒时[53] 也注意到了陈氏的商贾文化意识,[54] 他说:"谈论陈继儒,必须把商业因素考虑在内。因为,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清高的文人,也不是拿皇家俸禄的官吏,而是一个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靠市场生活的山人。他要赚钱,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点商人习气,也不难理解……把神圣的文学,降低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把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变为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对他的得和失,看得比较透"。[55]这些埙篪相应的言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对于解读袁枚一辈特殊形态的隐士行迹,以及解读性灵说的外部语境,它们肯定是有着重要参照价值的。

从书中种种激赏之语,我们完全能感受到蒋寅先生对袁枚"诗心"的深探与深知,故以上申说并非不同意本书仅以区区万把字篇幅"略述"其瑕疵,而只是觉得对此还可以找到更加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多余的"补白"背后包涵的乃是读者后学对本书乃至后续《清代诗学史》撰著的更高期待,正如前文所说,下潜、遥望、有我之境这几个要素不只是针对这部体量巨大的《清代诗学史》而言的,那更是所有诗学史/文学史撰述应该追求标举的"有境界"的"高格"。

注释:

〔1〕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78 页。

〔2〕〔3〕〔7〕〔20〕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后记"第 743、742、743、741 页。

〔4〕分别为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蒋寅:《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5〕《清诗话考》收录清代诗话"见存"者 967 种,"待仿"者 504 种。

〔6〕《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导论"第二节对此有比较详尽的列举,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2 – 15 页。

〔8〕〔9〕〔10〕〔13〕〔14〕〔16〕〔17〕〔18〕〔19〕〔21〕〔22〕〔24〕〔25〕〔27〕〔29〕〔30〕〔31〕〔32〕〔33〕〔38〕〔39〕〔40〕〔41〕〔42〕〔43〕〔44〕〔45〕〔46〕〔48〕〔50〕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71,71,76、72,390 – 522,395,153,557,605 – 653,696、702,56,20 – 25,171,187 – 203,171,741 – 742,72,309 – 310,324 – 326,742 – 743,743,56,101,240,594,660,35,332,357,364 – 365,365 页。

〔11〕诸如:"诗之宗法在神理,而不在形似","夫逼真即非真也。毋论东家效颦,只益之丑,即优孟为叔敖,胡宽营新丰,似矣,然究是真叔敖否,真新丰否","曾子固下笔时,目中不知刘向,何论韩愈……作诗须得此意",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98 页。

〔12〕《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引韩廷秀《题刘霞裳两粤游草》句。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五册,王英志编纂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853 页。

〔15〕袁枚:《再答李少鹤尺牍》,转引自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40 页。

〔23〕此处似尚可补充一个"本朝诗"的典型例证:弘历不喜钱谦益,斥之为"非复人类""可鄙可耻",而于吴伟业好感颇多,《御题吴梅村集》有"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之句。乾隆朝伊始吴诗研究呈热火局面,如靳荣藩《吴诗集览》、程穆衡《梅村诗笺》、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等多个版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诗高度评价,赵翼《瓯北诗话》列吴氏为清代第一大诗人,管世铭《论近人诗绝句》"失路几人能自讼,莫将娄水并虞山"之类说法的出现,与弘历的态度显然密切相关。

〔26〕本书给出可考出版年份者(含重版)三十九种,另有不详出版年月者六种,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学问与性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77 – 179 页。

〔28〕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34〕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卷首,武林谋新室,1910 年。

〔35〕〔36〕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4、510 页。

〔3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见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553 页。

〔47〕马大勇在 2020 年 7 月 16 日《南方周末》"秘密书架"栏目发表《书边余言》,提及受到影响最大的几部书之一就有《随园诗话》,并有"以随园二百年下私淑弟子自居"之语。

〔49〕"疏误"部分属袁枚的学力或写作态度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51〕〔52〕严迪昌:《清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第 746 – 747、790 页。

〔53〕蒋士铨作《临川梦传奇》,陈继儒出场诗句云:"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鲁迅尝引之指袁枚。

〔54〕〔55〕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31 – 52、41 – 42 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